

文化的重写：

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樊雪艳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东亚·思文丛书

文化的重写

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隽雪艳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包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日本句题和歌研究”项目成果,项目号:06JA75047—9901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隼雪艳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5

(东亚·思文丛书)

ISBN 978-7-302-18685-4

I.文… II.隼… III.白居易(772~846)—人物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4443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230

印 张:12.7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

定 价:0.00元

产品编号:029376-01

序

严绍璿

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中国唐代文学家白居易及其作品作为中华文化的典范对日本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十世纪时代,日本著名的学者庆兹保胤在他的《池亭記》(982年)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生活情趣。他说:“饭餐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这是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知识分子把中华文明作为生存典范而进行自身修养的经典性表述,而其中又以白居易的人格风范与诗文学作品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中具有最为持久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作为东亚地区灿烂文化形成的内在的理路脉络的一个层面,“白居易文学”作为一个丰厚的“文化文本”,它与日本文化(包括文学)的诸种复杂生动的内在关联,留给后世的“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许多重大的亟需研究者思索探讨的课题^①。

雫雪艳博士长期致力于日本古代文学研究,日前有机会拜读了她的大著《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深受教益,并由此而引发了自己一些长期萦绕心头的思考。

我国学者关注白居易文学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历史地位并进而考量它与日本古代文学相互关联的运行机制,大约开始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如果与这一文化事实发生与存在的实际年代相比较,我国学界在研究的“注意力”表达的时间上实在

^① 本文所设定的“古代”,是中国学界普遍的认知范畴,即以中日两国社会进程中的“近代”为分界。由此而定,则本文提及的“古代”,包括了日本史上一般设定的“古代”、“中世”和“近世”三个时期。

不成比例^①。但我们毕竟已经起步，已有若干论著问世。面对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熟悉和亲切，而事实上又是十分纷繁复杂的“文学”与“文化”的现象，我们已有的研究（这里主要是指我自己的论述）就显得肤浅和笨拙了，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把“论述”变成了介绍“文化流布”的新闻报导，有时候研究者意会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把握其核心也无法确切地加以表述。这是因为研究者面对的这个“白居易文学”，它作为文化史学上的一个“本文”，它与日本文学的关联，涉及到东亚文学中“文化传递”的一系列具有基本意义的理论问题，它对于日本文化（文学）的冲击而造成的日本文学若干层面中的“变异”，涉及到对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根本性评价问题。这样的课题，坦率地说，不仅是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或是一个“日本文学研究者”这样的“国别文学”研究者所能承担的，而且，也不是一般地识得日文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或是识得汉文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所能为之的。我一直期待着我国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学者，以自己敏睿的思考和正在积累的关于双边文化的丰厚的学识，在东亚文化（文学）的研究中，例如在“白居易文学”的研究中能够既踏实又犀利地把握住文化本相，进入到“文学传递”与“文学变异”的内在运行机制中展开研究，获得有价值的突破。

我初见雫雪艳博士的大著，从书题上看，觉得这是个比较文学中的“阐释学”或是“形象学”的论题，读完全卷，释解茅塞，原来全书的旨意致力于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阐明中国白居易文学在古代日本的流传，以此为基础解析日本文学的内在机制中所产生的相应的“变异”，并进而阐明在日本古代文学的样式与文化的理念中所产生的若干“新认识”“与“新样式”的发生理路。事实上，全书旨在阐明一种民族文学内的“文学变异体”生成的逻辑过程。著者在较为充分地把握这一课题的双边原典文本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形象”、“阐述”和“诗学”诸层面的融汇释解，把“异质文学”之间的传递与影响做到了“文学发生学”的层面。本书所体现的关于在比较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中，就其对于研究对象思考的深入，对于异质文学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内在机制“变异”观

^① 参见李书成主编、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辑《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刊，1995年版。

察的睿智,以及对于一种民族文学“自身变异”而产生“新体”的表述的明朗,以我个人的读书状态而言,在我国同类型课题研究中,不仅是在“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中,而且在广泛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确实具有独特的创新性价值。对我来说,至少是开启了自己长期在这个领域中探索思考研究而未能达到的一个新的境地,在隽雪艳博士的这部著作中获得这样的学识启示,我当然为之欢欣。

我在匆忙的阅读中获得了一些粗浅的体会,觉得本书的学术价值至少有这样三个层面是应该引起我们的同行和读者诸君充分关注的。

第一,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域外传播”的阐述,至今大多数采用“平面直线”的叙事表述形式,本著作则选取在特定时空中从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知识分子到镰仓时代禅宗僧侣编辑的以《千载佳句》、《和汉朗咏集》和《文集百首》等为核心的白居易文学的“句集”为考察“白居易文学”在日本的流布的依据。这些《句集》的编辑者各自在“白居易文学”中发现了自己和自己所代言的那个阶层所需要的精神形态,从而将白居易文学中相关的诗文句聚合起来夸张为他们自身精神世界的本源或是精神世界的襄理。阅读本书沿着著者这样的解析,使我们观赏到了白居易文学进入日本社会的全新的文化图像。这个图像在日本社会不同的进程中有不同的形态,这种不同形态的白居易形象各自形成的脉络,就是白居易文学在日本流布的轨迹。隽雪艳博士以睿智的文化学理论法则具体地把握住了白居易文学在日本社会流转的线索。她向我们展示的这些各不相同的白居易形象,其实都不是我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认识的“白居易”,而是日本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学者为他们自己的需要而言说的“白居易”。用“本源的白居易”去衡量“言说的白居易”是没有意义的,文化史学家的任务在于研究与阐述这些被“言说的白居易”之所以成为如此形象的广泛的文化语境。这里用得着马克思关于“文化传递”规律的一句名言,他说“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的阶段上,是适合于普

遍使用的形式。^①”我以为马克思的这一论说很准确地表述了文化流动的基本事实。雋雪艳博士在这个层面中的解析，不意与马克思的观察与判断正相一致，事实上也与我们现在把握的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国别范围内各种文化流转的真相相符合。本书的这一观念与表述为准确把握与阐述中国文化（包括白居易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作了新的努力和提供了相应的范例。

第二，本书以相当的功力研讨了日本古代文学中一种具有特别意味的文学形式——“句题和歌”。从一般的日本文学研究而言，“句题和歌”并不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则可能是具有“国学观念”的研究者本能的弱视心态，一则可能事涉“和汉”诸方面的文学研究需要相应的学识，一则也可能稍年轻的学人对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总体文化势态缺乏理论与事实的感知等等，总之，在我读到的《日本文学史》或《东方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什么文本提及作为“日本文学”的“句题和歌”^②。本书把“句题和歌”列为专章，成为著者研究白居易文学与日本文学关系一个重要的层面。诚如雋雪艳博士所言“句题和歌，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句题，一般是一句或两句或多至四句的汉诗诗句；二是和歌，即根据“句题”的内容而作的和歌。”一般的读者不易理解这种文学样式，其实，它是中国文学进入日本文学的过程中在形式与内容上被解体而以它的“有价值成分”在日本文学中形成的“文学新体”，我们把它称之为“变异体文学”。一种文学进入异质文学中，与异质文学相互碰撞后，以多样性、互补性、变异性与统一性的状态促使异质文学内部产生“新的文学样式”即“变异体文学”，这应该是文化（文学）传递的终端成果之一。

雋雪艳博士正是把白居易文学向日本的传递在这样的层面上追踪到了它的最终端的结果。20年来我们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一直主张探索和阐述“文学变异体”，揭示它的内在机制，阐述它的

① 见 1861年 7月 22日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

② 我这里指的是总的学术状况，就日本文学研究而言，事实上也有少部分学者是“和汉贯通”的研究者，以 1984年日本学术界建立“和汉比较文学会”为标志，学者们在研究中愈益意识到“和语文文学”与“汉语文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而致力于综合的研讨。

形成的轨迹,可是,在“文学文本”层面上能真正实践这样的理念的成果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①。我们从事于双边文化或多边文化的研究,如果不能在文化运行的最终端把握着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那么我们就没有把自己设定的课题最终做到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应该高度重视雫雪艳博士关于“句题和歌”的研究及其表述的内容所提示的“文学关系研究”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路径和方向。

第三,本书在考察特定时空中日本社会对白居易形象的不断重写的过程中,著者以宽阔的学术视野使阐述的注意力超越文学领域而进入日本社会的思想层面,论说以白居易的“狂言绮语”主张为核心,认为“日本人从白居易的句子中获得了这样一种理论:文学如果是为了赞佛而作,那么,尽管其‘狂言绮语’的性质没有改变,但是,随着它成为传教性质的存在,原有的罪障便可消除,并且,文艺活动可以成为信仰佛教的助缘。”从而催生了“和歌即是陀罗尼”这样的世俗文化与佛教信仰之间协调与平衡的心理。这样的心理特征事实上也是白居易文学东传中在思想层面产生的“变异体”形态。在进入中世时代后,白居易对自身生存乐趣的这种表述,逐步内化为日本更广泛的阶层在自身生存中从事文艺活动以及超越文艺而构筑其它多种具有“美意识”价值的民俗活动例如在“歌道”、“花道”、“茶道”等的形成与发展中所需要的心理认知的精神助力。雫雪艳博士在这里揭示了白居易文学介入日本特定时间中的从宗教信仰到民俗美意识活动的思想精神形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学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学理上提示了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从事于“文学”研究的同时,必须扩展自己的视野,把对“文学”的研究放置于“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唯其如

① 1985年我在《中国比较文学》同年第一期上刊出《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的模式与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文又见1987年北大出版社刊《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文学关系”研究中探索与阐述作为最终端成果的“变异体”,推动对于现今各类《文学史》著作的重新认识,但国内响应者寥寥。2006年以来,曹顺庆教授与他的弟子连续发文,呼应关于“文学变异体”的研究,但只停留在“论说”层面而未见关于具体“文本”的探索与阐述。“文学变异体”的探索,它的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可能比一般论说更具有真正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此,才能在更加深刻和广泛的层面上确认对所研究的“文学文本”的认识。

隼雪艳博士的大著《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的刊出,再次表明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我们在中日文化(文学)研究与中外文化(文学)研究中经过自己的学识积累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具有理论意义的表述系统,它以系列文本的解析为基础,可以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推进到它的终端目标。这是我们的研究者以自己辛勤的努力和聪慧的睿智综合而达到的成果。30 年来,隼雪艳博士从北京大学的一个本科学生成长为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可以说,我是她 30 年学术道路的同路人和见证人。她作为 1977 届的学生进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经受了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良好的训练,我作为她当年学士学位论文《关于日本钞本〈文选集注〉》的指导教师,意识到她在中国古典文化学习中正在寻求其国际视野。20 年前她前往日本留学,先是受业于著名的户川芳郎教授(现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后在三角洋一教授(现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主任)指导下进行《文集百首》的研究,并以此研究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完成了学术重点的转移。从中国古典研究转向日本古典研究,这当然是隼雪艳博士的学术兴趣和志向,但这同时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包括语言和文化的相当量的学识修养,她以近 20 年的努力而修炼成对于中日双边语言和文化的“真正的”理解和把握。记得 30 多年前我进入日本文化研讨的时候,周一良教授曾经对我讲过的一句使我铭记终生的教诲,他说:“一个从事国际文化研究的人,要能够在中国讲中国文化,在日本讲日本文化,这才是站得住的。”周先生本人就是这样在中国和日本文化研究中根深叶茂而任何风吹雨打不能摇动其根基的学者。读隼雪艳博士的这部著作,其中透露出的她对于中日两国古典文化的把握与运用、解析与阐述,可以体会出她内聚的学术修养和功力,正在沿着周一良先生所期望的学术模式发展,这不仅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所期待的,更是我国人文学界所期待的新一代多元文化复合型的研究者。

当年我在北大担任指导隼雪艳博士学士学位论文时,自己不过是 40 刚出头的中年,现今读到她的这部大著时,已经耄耋之期。

岁月这样匆匆地过去,但在回味岁月匆忙的时候,却意会到时间和实践已经造就了一代超越自己的强有力的研究者,回想他们的努力和业绩,自己有了许多的欣慰和永远的安逸。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答应了雋雪艳博士的好意,把自己关于这部大著的读后感想匆匆草拟于此,是为序文。

2008年10月 撰于香港维多利亚柏景台住宅

(序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前 言

谈起中日文化交流,我们很容易立刻想到日语中的汉字、日本文学中的汉文学以及日本的儒教等等,也有很多人认为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不过是对中国文化的模仿,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或许还有一些人误以为中国的古代文化流传到了日本以后以其本来的姿态成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回顾以往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可以说大多数成果更关注中日文化的同一性,关注中日之间的共同点,相对而言,对两者之间相异的部分研究较少。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例,诸如《文选》对日本汉文学的影响、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对和歌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对《源氏物语》的影响等等,所谓的影响研究非常盛行,人们往往通过影响关系而论及中日文化的共同点或中日文化的交融。

当然,这些研究揭示出许多历史的事实,澄清了许多重要的问题。面对这些庞大的研究成果,我个人认为有必要提倡从其他角度的关注,例如,从日本文化、日本历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可以看出哪些日本人的特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如何被阅读、理解,日本人面对中国文化选择了什么,舍弃了什么,“误读”了什么,以及发生这些取舍、进行日本式诠释的原因及其与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怎样的关系,等等。我相信,这些角度的研究一方面会加深我们对异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加深对本国文化的认识,可以相互成为参照物。

若在此种意义上谈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话,白居易与日本文学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研究课题。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氏曾云:“若撇开白氏文集论及平安时代初期以后的我国的文学,恐怕终究难以把握其真实的状况及其奥义,并且其鉴赏和批评也难

期正鹄。”^①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中村真一郎氏则指出，在现代中国，白居易被看做一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今日的欧洲，白居易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表现禅宗思想的文学作品；而对日本的王朝人来说，白居易则是一位极尽婉转之情的、罗曼蒂克的诗人，三种评价彼此大相径庭^②。我国学者严绍璁先生曾重点论述了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并指出：“自九世纪中期以来，日本官僚知识阶级对白居易及其文学长时间地表示了崇敬和仰慕，并且在某些年代，曾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但是事实上，这个阶级的各个阶层谁也没有从总体上真正理解和认识过白居易，谁也没有真正按白居易文学的本来面貌吸收过他的作品。是的，平安时代的日本官僚知识分子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把白居易的一个侧面理解为白居易的整个形象，从而加以膜拜的。”^③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对白居易文学的受容也不断发生变化，那么，探寻白居易在日本古典中的形象以及他改头换面的原因或许可以使我们对中日之间历史与文化的不同增加些许新的认识。

白居易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已经流传到了日本。乐天自书《白氏长庆集后序》^④云：“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乐天重记。”现在一般认为，《白氏文集》传入日本的时间大约在公元834年左右^⑤，白居易文学传入日本后，以空前的规模流行于日本，渐渐取代了《文选》在日本的地位。不久，《白氏文集》又成为宫廷侍

① 金子彦二郎『平安時代文学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序 鎌倉芸林社，1944。

② 中村真一郎「白居易評価の猫選について」见西村富美子『白楽天』東京：角川書店，1988。

③ 严绍璁：《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19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④ 见朱金成《白居易集笺校》外集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本书所引白居易诗文皆根据此书，后文不再注明。

⑤ 金子彦二郎『平安時代文学と白氏文集——道真の文学研究編第一冊』94頁 鎌倉芸林社，1948。

读的科目之一,与儒家经典具有同样重要而显赫的地位。此后至少几百年间日本的文学作品——包括汉诗、和歌、物语、谣曲等各种体裁——到处都渗透了白居易文学的痕迹。

白居易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日本平安时代、中世时代的宗教思想史以及其后的民俗史等等,都与白居易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内容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流传至今。如日本京都每年夏季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祇园祭”所供奉的对象中就有白居易;大约15世纪左右日本人创作的古典戏剧剧目《白乐天》,在20世纪90年代末还曾在东京的剧场上演。

关于白居易与日本文学、日本文化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课题,国内外均有许多相关研究。如日本有太田次男主编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第3卷至第6卷(勉诚社,1993—1998)、新闻一美的《平安朝文学与汉诗文》(和泉书院,2003)、中西进的《源氏物语与白乐天》(日本岩波书店,1997)以及岩波书店、小学馆等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所收录的文学经典注释等等。在我国,严绍璦《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第五章和第六章、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二章、宋再新《和汉朗咏集文化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刘瑞芝《论狂言绮语观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等成果也都从不同角度深化了这一课题的研究。不过,总的来看,无论在我国还是在日本,学术界主要关注日本文学与白居易这一课题,而对日本民俗文化、日本宗教思想史、日本古典戏曲等其他领域与白居易的关联研究相对薄弱。在日本的研究成果中来自日本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多于中国文学领域的学者,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文学在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日本学者的研究十分细致、绵密,但是,总的来看,论证日本文学与白居易诗歌的渊源关系的较多,即考证日本文学中的某一作品其某一词汇、章句乃至作品的构思来源于白居易的某一作品等等,与此相比,对日本人接受白居易的具体过程,特别是日本人根据自身的需要对白居易文学的裁剪、过滤和文化的重写等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鉴于以上思考,笔者希望自己在关注日本人对白居易文学的

学习、模仿的同时也注重研究日本人接受白居易的具体过程,那些取自于白居易并且已成为日本文化一分子的语言、思想等具体事例,有些在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与其原本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有差异。分析这些差异及其原因能够使我们加深对异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加深对自身的理解。既关注同一性也关注差异性的双重视角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时所不应忽视的。

本书第一章、第二章主要以日本白居易受容史上几部重要的典籍——《千载佳句》、《大江千里集》、《和汉朗咏集》、《文集百首》等为材料,通过分析这些典籍所收白居易诗的特点等问题,探讨白居易文学在日本平安朝的命运以及形成命运的诸种文化上的原因,就白居易在日本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略作钩沉和叙述: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广大教化主”,在现代被称为“人民大众的诗人”、“现实主义诗人”的白居易在古代的日本或为优雅、潇洒、感情丰富细腻、洋溢着王朝风流气息的诗人;或为一个智慧的隐者;或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另外,还重点讨论了日本文学史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体裁句题和歌的意义,从翻译、改写、创作等多个角度讨论了句题和歌的性质,把句题和歌放在跨文化语境下、放在中国文化东渐这一历史平台上讨论其产生的必然性。第三章、第四章讨论了日本中世文艺理论的发展与白居易的关系,从日本歌道形成的角度分析和评价白居易“狂言绮语观”在日本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五章、第六章的内容则不局限于白居易与日本文化这一课题,收录了笔者探讨日本人的生命观、美学价值、对宗教的理解、对自然的态度等问题,试图对日本民族的深层文化有更多的理解。

尽管上文叙述了笔者研究的方向和目的,但是,当细数自己做过的工作时方知成果何其微不足道,深感路漫漫而修远。但愿编辑这本小书能成为自己一个总结和反省的契机,并希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目 次

序	001
前 言	009
第一章 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001
第一节 贵族文人的榜样——风流才子白居易	001
第二节 乱世人生的楷模——隐士白居易	012
第三节 道的悟者——文殊菩萨的化身白居易	024
第二章 句题和歌与白居易	036
第一节 句题和歌：翻译·改写·创作	036
第二节 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看句题和歌	045
第三节 《文集百首》句题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057
第三章 日本中世的文艺理论与白居易（一）	066
第一节 “数奇”的价值	066
第二节 日本平安时代的“狂言绮语观”	069
第三节 日本中世的“狂言绮语观”	070
第四章 日本中世的文艺理论与白居易（二）	074
第一节 藤原定家的歌论与白居易	074
第二节 “心を澄ます”的意义	076
第三节 “白氏文集之第一、第二帙”所指卷第	080
第四节 定家的歌论与《文集百首》	082

第五章 日本思想散论	084
第一节 《三教指归》的儒教和道教	084
第二节 论《草堂记》、《池亭记》、《方丈记》的思想特征	091
第三节 道元思想的现实性	100
第四节 吉田兼好生命美学的构造——以《徒然草》为中心	105
第五节 日本人的美意识与无常思想	114
第六节 日本人的自然观	124
第六章 翻译研究心得	131
第一节 关于译文“本土化”问题之思考	131
第二节 从翻译的视角看“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传播	135
第三节 鉴赏标准的多样化与诗歌翻译策略的选择	145
附录一 关于日本现存《白氏文集》旧钞本	157
附录二 藤原定家《文集百首》	162
参考文献	172
后记	177
索引	180
和歌初句索引	182

文化的重写： 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第一节 贵族文人的榜样 ——风流才子白居易

平安朝著名文人都良香(834—879)有一首《白乐天赞》，诗云：

有人于是，情实虚深。
拖紫垂白，右书左琴。
仰饮茶茗，傍依林竹。
人间酒癖，天下诗淫。
龟儿养子，鹤老知音。
治安禅病，发菩提心。
为白为黑，非古非今。
集七十卷，尽是黄金^①。

这首诗勾勒出一幅典型的平安朝文人眼中的白居易画像：情感丰富，热爱诗、书、酒、琴、茶，与鹤为伴，具有自由、超脱的精神世界，往来于佛教与世俗之间，不受传统或当世规范的束缚。

另外，还有一部平安朝的著名文人大江维时(888—963)编选的可相当于唐诗荟萃的书籍——《千载佳句》，也是我们了解白居易在

^① 中村璋八、大家雅司，《都氏文集全积》，东京：汲古书院，1988.32.